

儒学的现代意义及其传承

钟青林¹, 胡丰顺²

(1.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 华中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作者简介] 钟青林(1955-), 男, 湖北建始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教授,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 胡丰顺(1979-), 男, 湖北钟祥人,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生,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

[摘要] 两千多年来, 儒学已深深地积淀于中华民族的心理之中, 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 一些优秀的传统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因素, 是中华民族发展和复兴的深层次精神支柱, 在精神相对贫乏的现在, 我们有必要重建儒学。在儒学的传承上,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儒学本身的开放性和儒学的生活性本质, 防止把儒学狭隘化, 政治强化。

[关键词] 民族哲学; 人文关怀; 开放体系; 承传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2-0163-05

炎帝和黄帝两个部落的联盟使中华民族初具雏形, 但中华民族真正得以定型, 应该是在儒家学说的兴起和推广之后, 它使中国当时相对分散的邦国形成一个有统一的思想体系和统一的思维语言的大中华民族。2500年来, 儒家学说始终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 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结构。它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的深层次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源泉。但是近代以来, 出于政治目的和现实功利, 儒家学说被人为地打断。我们必须承认, 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体系都有其惰性, 儒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 我们的错误在于, 我们在批判儒学时, 把儒学的合理内核也统统丢弃了。这种做法的严重后果就是引起社会思想的混乱, 进而导致社会的动荡。在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 这一严重后果因被遮蔽而体现得并不明显, 而一旦政权得以稳固, 这种问题迟早会凸显出来, 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封建因素的遗毒, 另一方面批孔之后人们思想的空白迷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思想上的空白迷惘导致文革的狂热、持久; 还有20世纪80年代末的六·四风波, 如果说这一事件是由资产阶级自由化所导致的话, 那么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代中国人思想灵魂的欠缺与迷失, 90年代的法轮大法猖獗也可说明这一点。

因此, 儒学在现代的意义, 首先应是思想上的, 其次是现代社会十分缺乏的人文关怀精神; 只有在思想动力的推动下, 在人文精神的关怀下, 社会才能生生不息地健康发展。

一、儒学——中华民族的哲学

罗素说过:“要了解一个民族, 必须先了解她的哲学。”^[1](第15页)罗素的话有一个潜在的主题, 那就是没有哲学的民族将不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总是和她信奉的思想同时存在, 互为标志。

民族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 有其特定的内涵。民族哲学不是有意识地把世界观理论化、系统化。严格地说, 它应是十分松散而又极其牢固的思想体系。在以前的儒学是否是哲学的讨论中, 我们往往用理论化、系统化的哲学模式去硬套儒家学说, 硬套的结果总会使儒学僵化和狭隘化。

毫无疑问, 儒学是中华民族的哲学, 它是松散而又极其牢固的思想体系, 不是世界观的纯粹理论化、系统化。儒学作

为一种民族思想体系,它渗透于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特色与智慧。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从没有为信、孝、尊师、爱幼等正式立过法,但在古代社会里,人们之间特别是普通大众之间的信、孝、尊师、爱幼等是举世皆知的;无论中华民族处在繁荣昌盛之中还是处在磨难忧患之中,其所具有的巨大向心力与凝聚力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的维系作用,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本质属性,成为民族心理的积淀物。

把儒学简单概括为天道、人道、伦理等哲学是有失偏颇的,对儒学的发展也是极其有害的。《中庸第十三章》中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这一段话,很难绝对地肯定孔子是侧重道,还是侧重人。有人认为孔子的这段话是讲道和人的统一性,并强调人要以道为基础,从理论上讲这种看法是合理的。但是正是由于这种理论的强化使人和道的关系变得十分绝对起来,导致社会上很多人把十分平凡的中庸之道看成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道加以膜拜,从而使祭祀、占卜等迷信之风盛行,使道与人的关系变得十分狭隘。其实,在实际生活中老百姓只是按照“道不远人”来行动,无需也不必对其做理论化的阐释,在其行动中并没有一连串理论作为指导,它是思想内部深层次的东西,是自然外露的。

前面已经说过,作为一个民族,是和她所信奉的哲学互为标志的。儒学这一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色与智慧,它作为一种民族哲学指导着社会的实践,它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深层次动力。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每一次思想领域的荒芜都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动荡,社会主义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要想有持续不断的后劲,儒学合理内核的重建是必须的。

二、无法释然的情结——儒学对人的终极关怀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日益漠视和隔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事实的残酷性是:“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2](第3页)人不但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还漠视甚至设法摧残别人的生命。国际社会呼吁人道主义与人权,从一个侧面透视了现代社会的冷漠与冷酷。毫无疑问,现代社会缺乏的正是中国传统儒学所具有的那种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情结。

一种学说如果只涉及经济领域,或是只涉及政治领域,它一般不会存之长久。在这里,我赞同梁实秋在《文学批评辨》中的观点:只有写人性的东西才能存之长久。孔子的仁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对人的终极关爱,在人类历史上,儒家第一次将人从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唤起人们珍视生命的意识,呼吁社会建立以珍惜生命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伦理秩序,把人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客观地说,一切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与重视,都是建立在对自我生命的觉醒和珍视基础之上。在奴隶社会,尤其是在春秋战国的战乱里,人的生命是相当低贱的。在孔子之后的庄子用击缶高歌为其妻送葬,这里面其实充满了对生命低贱现实的不满却又十分无奈的情绪。庄子的这种做法是很消极的,他不像孔子从正面来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因而也就找不出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孔子从正面出发,严肃认真地审视人的生命:“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有疾也!’”(《论语·雍也》)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

孔子把生命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从正面对人生的短暂发出悲歌,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

梁漱溟先生认为儒家学说的本质是生活,其实更具体一点说,它是关于怎样做一个有血有肉、有亲情的人的学说。孔子在《礼记·中庸》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仁者,人也。”他强调人的本质属性是仁,这一命题所包含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指出生命的价值在哪里。长期以来,中国人衡量一个人的优劣,常常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善良的一面,说白了就是“仁”还存在不存在,这既是测量自身的一个标准,也是测量他人的一条准绳,这使得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很重感情的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和融洽。在《论语·颜渊》章中,当樊迟问何为仁时,孔子说:“爱人。”在《论语·子路》章里,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孔子这一系列观点其实质是在讲一种奉献精神,提倡一种关爱道德,这对现代人人与人之间日益冷漠关系的改善,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过去我们看待儒家学说,往往从政治层面上考虑,导致许多理论不能得以正确理解,譬如其中的仁政思想,忠恕孝伦理道德及教育情结等。孔子的许多思想不适合当时,更不要说以后的封建政治,这一点已成定论。其实,在孔子学说中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的珍视,是对生命的珍视,如果我们从这个层面上理解,儒家学说对人的终极关怀精神对现代社会是十分有意义的,说得夸张一点,儒学是拯救我们人类失落灵魂的一剂良药,它呼唤着人与人之间温情的重建和对自己及别人生命的珍视,西方社会在20世纪纷纷重视儒家学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儒学可以防止社会和人的堕落。

“民不可侮,教之,民可侮也。”(《论语·泰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

格”(《论语·为政》)。孔子的这些理论观点都是专制统治者所做不到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太适用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内法外儒,这充分说明了儒家学说作为政治理论的不适宜性。但从孔子的这些理论可明显看出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在里面,而这一点是建立在对生命珍视的基础之上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曾起过威慑统治者,并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就是在今天我国法治还不完善和健全的情况下,它对遏制腐败、反对专权等仍有重大意义。

儒学所包含的强烈的人文精神、民本思想及对生命的珍视是人类历史上的永久话题,20世纪整个人类社会所呼吁的人权及人道主义,从一定程度上说,与儒家学说的人文内涵有很大的契合度。

三、民族复兴的选择——儒学与中华民族的再度融合

在以前我们曾有这样的结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以今天的事实来看,这一结论是武断的。其实,在每一次试图割断儒家传统思想的政治文化运动之后,整个社会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动荡,事实也证明,我们一味地引进西方的思想价值体系是有害的,它解决不了中国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处理不好中华民族的伦理价值取向,并常使我们陷入借来的钥匙打不开锁的尴尬境地,借助于西方的思想价值体系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复兴原动力仍在于传统的儒家学说。

我们承认,儒家思想的确存在着很多与我国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因素,但它2500多年来所积淀的优良民族特质在现代化中的动力作用却是不能被抹杀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儒家思想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等方面也起着重大的作用。

市场经济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就会导致物欲横流,危害社会;但如果我们因此就封杀市场经济,这样做也会葬送中国社会,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明显的悖论,这也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迷茫和困惑,他们认为经济发展与道德沦丧同步,道德进步与经济贫困同在,并认定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他们或者否定市场经济,或者否定道德。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孔子的主张:“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孔子没有否定利,他曾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但他却反对不以其道得之的富贵,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并要求人们“见利而思义”(《论语·宪问》)。按孔子的观点,追求富贵是天经地义的,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从理论上指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但他已明确地判定了经济不能被人束缚的深刻的社会现实,这种认识对我们坚定地发展市场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社会的动荡,必然会引起经济的混乱,在春秋时期,经济的混乱是肯定存在的,孔子用“道”和“义”来规范和约束,并对不义之富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这对于认识我国现在市场经济中为了利而投机倒把、假冒伪劣等不健康现象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我们提出依法治国而相对忽视道德修养的今天,孔子的这段话具有重要的意义。孔子主张礼必须与仁结合,强调仁是礼的基础,因此,他所提出的礼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在我国,事实证明,单纯的法治治理并不能挽救社会道德的沦丧和社会风气的颓变,这正好应验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却“无耻”的事实。只有“道之以德”,民才能“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我们在进行法治治理的时候,还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以文明的姿态屹立于民族之林,正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伴随着人类的现代化进程,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对自然界的严重掠夺已给人类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威胁。长期以来,西方哲学体系侧重强调自然界对人类的满足,从而导致一些自然资源趋于枯竭,严重影响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儒家学说重视天人的和谐关系,它虽然承认天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否认二者之间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天定人事”和“人定胜天”的大讨论,每一次讨论的结果都是人的地位得以提高,但在实践中却往往是二者的中和,中国传统诗歌主张情景合一,并且山水、田园诗十分发达就是很好的证明。《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行事时对自然界的尊重。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对我国环境的保护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无疑也是大有裨益的。

儒家思想在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一种思想体系所不能取代的。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儒家伦理体系,使中国人十分重视血缘亲情,形成亘古不灭的炎黄子孙情结,从而强烈地渴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香港、澳门在与大陆分离了漫长的时间之后,最终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国的综合国力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儒家思想的血缘维系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相信,儒家传统思想对于台湾和大陆的统一仍将起到巨大的凝聚作用。

总之,儒家学说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我国民族复兴的必备要素,是中华民族奋斗不息的动力源

泉和深层次的精神支柱,只有重建儒学中一系列优秀的思想价值体系,我们的民族才能以鲜明的姿态屹立于民族之林。

四、儒学得以承传的根本原因——儒学的开放性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有其一定的惰性,儒学也不例外。但另一个基本事实是: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儒学遭到几次重大冲击,并曾一度短暂中断过,但最后仍是儒家思想居于正统地位,并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的特质。其实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尤其是一种先进的思想体系,它本身是具有开放性的,儒学能得以承传至今,其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首先,从儒学的发展脉络来看,儒学在成立之初主要承传了周代一系列典章制度、民情风俗,这是肯定的,但它决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我们知道,儒学的兴起正是历史上百家争鸣之时,当时社会思想是多元的,任何固守自家思想体系的思想是注定要灭亡的。儒学一方面适应社会思想多元化格局而出现,一方面又必然在百家争鸣中吸取众家之长。在这个方面,最明显的是荀子的“援法入礼”,《荀子》三十三篇,不仅是儒学的集大成之书,而且对其他诸派的思想如兵、法、道甚至阴阳都有所取舍整合,这也是《荀子》一书之所以驳杂的原因。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西汉统治策略由黄老之术向儒家正统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儒学不可能不受到黄老之术的影响,董仲舒的“讖纬”之学从本质上讲就是黄老之术和儒学结合的产物。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儒学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新兴的玄、道、佛三股思想先后进行吸收融合,以适应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有名之士就把孔子和老子,道家的无为与儒家的伦理学说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玄学。一部《世说新语》既可以看出忠、信、孝及浩然之气等儒家伦理道德与儒学精神实质,又可以看出道家清静无为的影子,“因此玄学既不是道家学说的变种也不是儒家学说的单纯延续,它是儒道合流的思想体系”^[3](第43页)。进入隋唐以后,儒学与道、佛之间进一步融合,到唐代的儒学已很不同于先秦两汉时的儒学,“它已吸取了道、佛的心性之学,使心性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世间生活相结合,既讲参与政治,又讲心性修养,既讲天道,又讲人道,这个中心主题构成了唐代儒学的特色”^[3](第46页)。

隋唐之后兴起的程朱理学对儒学进行了一些发挥,加重了心性内容,更加注重个人修养。严格地说,这些内容都不是新颖的,它是对隋唐时期儒学中心、性的过度深化和强化,同时再加上明清统治者强权的介入,使得隋唐以后的儒学路子越走越窄,一些理论也越来越绝对和狭隘,这些都导致近代中国逐渐走向保守、愚弱,缺少变通。

其次,我们从儒学的本身来看,儒学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自从儒学产生以来,人们对它的诠释、理解往往不尽相同,并且有时还大相径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开放性。从上面儒学的发展脉络来看,玄、道、佛之所以能融入到儒学思想体系中,也是与儒家学说本身的开放性分不开的。

儒家所提出的一系列伦理道德、天道、人道思想、教学原理等等都是十分模糊的,是不能被绝对化的。依本人来看,儒家所提出的一系列命题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以后对儒家的各种诠释及发展都是从儒家的具体命题中抽出来的一个方面,这好比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为后来人提供了一座具体的庐山,后者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去就会有不同的峰面,这里仅以孔子提出的“仁”为例。

孔子在《论语》一书中提出“仁”字的共58章109次,每一次对仁的阐释都是处于不同的背景之下,其含义也大不相同。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论语·宪问》)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从上面两段话中可以看出,孔子的仁明显有矛盾之处,如果管仲为仁,则“杀身成仁”就站不住脚;如果“杀身成仁”是仁的一种至高境界,则管仲为仁就不能成立。就是在这种是与不是之间,孔子的仁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体系,让我们自己去填充,在不同的场合下对仁做出不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在实际行动中不因一种仁而束缚了另一种仁,近代梁启超和谭嗣同的“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一去一留都被认为是仁义之举,就是这种体现。

并且,长期以来,我们总认为孔子的仁过于呆板迂腐,近于妇人之仁,这种看法无疑是错误的,它是把孔子之仁绝对化、抽象化的结果。《论语·雍也》有这样一段话: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仁并非是迂腐呆板的,它里面充满了变通的因素,我们之所以会得出以上的错误结论,是因为我们把孔子的仁学逐条抽象化了,抹去了仁学本身所含有的变通因素。《韩非子·显学》记载,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这一方面固然说明儒学的兴隆繁盛,同时也证明儒学本就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从不同的方面理解儒家学说,并且这其中的多种理解往往是并行不悖的,多种理解适应了生活的复杂多变性。

儒学两千多年来逶迤不绝,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本身的开放性, 从而能把不同的时代精神、时代主题融入进来, 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五、简单的补白——对儒学传承的建议

如前所述, 完全割断儒学传统思想会导致思想的混乱, 社会的动荡, 我们不能重蹈 20 世纪以来的彻底否定儒家传统思想的做法, 但是在传承儒学中, 我们也决不能良莠不分, 要用批判的方法对其进行扬弃, 本人认为当前要做好儒学的传承工作应首先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儒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其本身是模糊的, 我们在对其进行阐释时决不能望文生义, 使其绝对化。汉唐的繁荣, 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儒家传统思想融合了时代精神、汲取了外来文化的结果。儒学本身的开放性要求我们把时代精神融入其中, 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 只有如此, 儒学才能适应时代发展, 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二是儒学的本质是生活, 属于思想领域, 我们不应该用政治手段、高压政策对其加以干涉或强化, 使其成为维护政权或为统治服务的工具。它的作用是而且只应该是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深层次的精神动力。任何思想体系一经政治强化, 就会或多或少地窒息、僵化, 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

儒学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是以传承的科学性为前提条件的。只有科学的传承, 儒学才能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从而指导中华民族向前迈进。

[参 考 文 献]

- [1] 远志明. 沉重的主体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2] 郭宏安. 加缪中短篇小说集 [Z].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5.
- [3] 许凌云. 浅论隋唐儒学发展的历史趋势 [J]. 齐鲁学刊, 1996 (4).

(责任编辑 叶娟丽)

Confucianism's Modern Meaning & Its Inheriting and Spreading

ZHONG Qinglin¹, HU Fengshun²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ZHONG Qinglin (1955-),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ducation of thoughts & politics; HU Fengshun (1979-), male, Graduat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ducation of thoughts & politics.

Abstract: For over 2000 years, already the accumulation of Confucianism has been in the national heart deeply. It influences people's behavior and handling affairs imperceptibly, some outstanding tradition is the indispensable factor that we build modernization, it is the profound spiritual props of Chinese nation's development and rejuvenation, now relatively poor in spirit,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build Confucianism. In the inheriting and spreads of Confucianism, we should fully realize Confucianism's own opening and living essence, prevent Confucianism from melting narrowly and power strength.

Key words: national philosophy; humane care; opening system; spirit of times; inheriting and spreading